



音乐学研究丛书 □ 丛书主编 臧艺兵

音乐理论研究

臧艺兵 陈 永 /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音乐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臧艺兵

音乐理论研究

臧艺兵 陈永 /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乐理论研究/臧艺兵 陈永主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4

(音乐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22-4208-6

I. 音… II. ①臧… ②陈… III. ①音乐—艺术理论—文集

IV. ①J6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4470 号

音乐理论研究

臧艺兵 陈永◎ 主编

责任编辑: 王中宝

责任校对: 方汉交

封面设计: 甘 英

编辑室: 文字编辑室

电话: 027-67863220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 027-67863040 (发行部) 027-67861321 (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印刷: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督印: 章光琼

字数: 306 千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0.5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定价: 51.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音乐学研究丛书”是由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师们的部分论文、音乐创作和专著构成，出版这套丛书，我想具有历史的和学科的两方面意义。

第一，具有历史意义。华中师范大学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学，而它的音乐学院，也有 80 年的历史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算得上是中国近代高等音乐教育的滥觞之地之一。有足够的史料表明，作为 20 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存在过的 13 所基督教大学之一的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在 1929 年就成立了音乐组，并且开设了钢琴、声乐、视唱练耳、音乐史等各种专业课程。这个音乐组有数名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教师以及本国的教师教授这些课程，音乐组后来变成音乐系，一直延续下来，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外籍教师先后回国。新中国成立后，近代作曲家陆华柏曾在此担任系主任。先后有阴法鲁、刘已明、臧玉琰、甘宗容、黎英海、俞玉滋、阎国宜、张昌年、吴晓娜等在此任教。学院发展到今天，拥有教职员工一百余人，本科生 600 多人，研究生 100 多人。学院有音乐理论与作曲系、声乐系、钢琴系、器乐系、舞蹈系以及音乐教育实验示范中心、中国合唱艺术研究中心、天空合唱团、大地舞蹈团等，学院拥有 11 000 平方米的专用教学大楼和专业音乐厅。今年适逢学院 80 年诞辰，音乐学院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出版这套学术文

集也是对学院发展历程的一个见证和纪念。

第二，具有音乐学学科本身的意义。坦率地说，音乐作为一门艺术是十分大众化的，但是音乐学术却是一门大众不甚了解的学科，甚至常常有行外的人士诧异：音乐还能读到博士?! 即便是在大学，音乐学科通常也被看做是唱歌、弹琴之类带有装饰性的“特色学科”。之所以产生各种疑惑和曲解，恐怕主要还是缘于人们对音乐学科的陌生。另一方面，也说明音乐学自身向外界推介本学科的知识非常不够，本套丛书出版的也是在这方面的一次努力。

事实上，音乐学术同人类其它任何学科一样都由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构成。而且这门学科的学术历史源远流长，在西方，古代希腊音乐是与几何学、天文学、修辞学等并列的元学科。在中国，西周时期所提出的礼乐社会理想，奉“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为治理国家方略。《二十四史》中的每一个朝代都用不小的篇幅记录了当时的音乐成就。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仍然将表达音乐和谐的概念用于政治纲领表述。在东西文明的源头都不约而同地将人类对音乐的形而上思考作为普遍的哲学法则加以推崇，说明了音乐这种艺术形式所蕴含的丰富、深刻的人类学价值以及它在人类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由此可见，音乐学术研究不仅不应该忽视，而且亟待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和弘扬。

从学理上讲，人类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研究音乐现象，如生物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因为但凡人类生活涉及的领域，人类都可以用音乐表达它、反映它。反过来，因为音乐艺术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它不可避免地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讲，音乐学同政治学和经济学一样，是我们了解人类生存的一个独立的窗口和视角，而且是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是人类了解自身存在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途径。

音乐用极其严密的数理逻辑表达着变化万千的情感世界，以其众生皆明的表现形式体现了奥秘无穷的宇宙真理。从音乐的文化建构力来说，因为音乐具有独特的对人情感的控制作用，通过各种音乐作品、集体活动等暗示公众的群体情绪，从而引导社会思潮。它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历

来被明智的政府所重视。鉴于音乐对青少年的强大的影响力，许多文化商人也有意无意地通过把握青少年的音乐趣味，从而操控音乐产业的市场走向，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政治、教育、经济三方面的力量在社会这个平台上，常常通过音乐的中介进行博弈，来努力影响青少年的生活价值取向。而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人们的文化身份认同，音乐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凝聚作用。此外，音乐作为一种口头传承的文化形式，特别能够作用于传统的延续和某种文化气质的形成。

音乐的确包括了弹琴唱歌，但是，在这些歌声和琴声里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意义，却是要演唱者和演奏者赋予的。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运用怎样的音乐？怎样的音乐历史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文化真相？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选择音乐并用于陶养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我们以什么样的有效方式来实施音乐教育？……人类想要很好地运用音乐文化为自己的生活服务，就必须认真地研究它。

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提出“艺术与学术并进，质量与特色双赢”的办学宗旨，就是强调在努力提升艺术实践水平的同时，重视推进学术研究。综合性大学中的音乐学院，师生凭借多学科交叉的互助平台，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可以促进音乐学学科在本校获得长足的发展。这套丛书的集结出版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作为丛书的统筹者，笔者要特别说明，这套丛书的出版，自然首先是各位作者的功劳，没有作者的倾心研究写作，就不会有丛书的实实在在的内容，因此我在这里衷心感谢陈永老师、韩勋国老师、丁玲老师以及武陵、许慧敏等同学，他们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同时，要感谢责任编辑龚琼芳、周利伟、王中宝和复终审人员，图书的审阅、修定、校对工作十分繁复，他们为本书的出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为丛书增色不少。最后，要特别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范军社长、张小新书记、段维总编、冯会平主任等的真挚关怀和鼎力支持！

臧艺兵

2010年4月于武昌桂子山

003

目录

《宋史·乐志》的修纂与版本	李方元 (1)
隋前五部正史乐志及其文本传统	李方元 (9)
唐宋时期的正史乐志及其文本传统	李方元 (34)
我国正史《乐志》书写的形成与其音乐实践基础	李方元 (65)
《初学记》乐部资料述略	
——以前三个子目为例	李方元、刘张杰 (74)
说“缶”	李方元、张玉琴 (84)
走出另一种封闭	
——对近代主流音乐学术传统的追问	
.....	李渝梅、李方元 (98)
和雇制度及其在宋代宫廷音乐中的作用	康瑞军 (106)
历代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研究现状述评	康瑞军 (123)
论近代中国音乐文学史研究及其学科意义	陈 永 (137)
对叶伯和的再认识	陈 永 (149)
西曲歌寻踪	陈 永 (163)
近 20 年来中国弓弦乐器研究	胡 建 (179)
浪漫主义风格的奏鸣曲式及其主要特征	
——以柴柯夫斯基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	

.....	徐 玲 (188)
民歌素材运用于音乐创作的新思路	
——陈怡钢琴作品《猜调》的音乐分析	
.....	徐 玲、张 凯 (203)
音响认知度及其音乐表现意义	薛花明 (217)
乐队音响的表现要素	丁 玲 (226)
音乐创作教学的意义与实践	袁善琦 (234)
近代“教育新潮”与我国早期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	李方元、周 琼 (240)
论柯达伊音乐课程思想与实践	李方元、吴祖英 (254)
现行民族音乐课程能给我们提供什么	
——现行民族音乐课程批判	
李方元 (273)	
从多元智能的视角看音乐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	姚宇化 (294)
音乐教育的双重属性	张业茂 (300)
试论科学对音乐教育的影响	张业茂 (310)

《宋史·乐志》的修纂与版本

李方元

正史是我国历史著述的一种形式，其中辟《乐志》一类目，专记述音乐。我国正史计 25 部，凡《乐志》者 16 部^①。由于《乐志》与史书其他部类总为一书，因此，讨论正史《乐志》的修纂与版本，实际上就是讨论整部正史的修纂与版本。《宋史·乐志》亦然。

一、《宋史·乐志》的修纂

《宋史》的修纂开始于至正三年（1343 年）。该年三月，经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兼经筵官提出，元顺帝同时诏修《宋史》、《辽史》和《金史》。此次修撰三史，经过两年半的时间，到至正五年十月，三史撰成并上进朝廷。据《元史》卷一四三《巛巛传》载：

一日进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金、宋三史，岁久恐致阙逸。后置局纂修，实由巛巛发其端。

又《元史》卷四一《顺帝纪》载：

是月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

五年十月辛未，辽、金、宋三史成，右丞相阿鲁图进之。

元翰林国史院分局修撰三史，宋史局承担了《宋史》的修撰，据阿鲁图等《进宋史表》所载^②，参与此次撰修的人员多达 40 余人，其中史官

① 二十五史包括 1927 年完稿、1977 年由张尔巛等撰的《清史稿》。正史中有关音乐的专门记述，除《乐志》外，另有《礼乐志》、《音乐志》等撰述形式。

②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三，1922 年。

23 人：

都总裁官：脱脱；

领史事：阿鲁图，别儿怯不花；

总裁官：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杨宗瑞；

史官：幹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裘，王思诚，汪泽民，干文传，张谨，贡师道，麦文贵，余阙，李齐，刘闾，贾鲁，冯福可，陈祖仁，赵中，王仪，余贞，谭慥，张者，吴当，危素；

提调官：纳麟，伯颜，达切世帖睦迹，守简，岳柱，拜住，陈思谦，幹朮，孔思立等。

《宋史》的修撰者，各有分职，职专其事。总裁官欧阳玄、张起岩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元史·欧阳玄传》载：“诏修辽、金、宋三史，召为总裁官，发凡举例，俾论撰者有所据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议论不公者，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稿，援笔窜定之，统系自正。至于赞、论、表、奏，皆玄属笔。”^① 右丞相脱脱、阿鲁图拟进三史表亦由欧阳玄代笔^②。又《元史·张起岩传》载：“诏修辽、金、宋三史，复命人翰林为承旨，充总裁官，积阶至荣禄大夫。起岩熟于金源典故，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当，起岩据理窜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③

尽管在辽、金、宋三史中，《宋史》成书最晚，但其修撰时间也不足三年。以四百九十六卷的篇幅，能如此快完成，离不开当时一些有利的条件。例如，可资利用的宋代史籍比较充裕，尤其是宋国史仍在，元修《宋史》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准备，等等。在宋代，史馆和史官制度比较完备，撰有大量国史、实录、会要、日历、宝训史籍及其他文献，这些史籍和史料都较完整地保留到了元代。当元人进入宋京临安时，尤其留意宋朝的图籍文物。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丁未，元世祖下诏曰：

① 《元史》，卷一八二，1976年。

②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三，《进辽史表》、《进金史表》和《进宋史表》，1922年。

③ 《元史》，卷一八二，1976年。

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觐之礼，已遣使特往迎致。……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①

于是：

伯颜就遣宋内侍王埜入官，收宋国衮冕、圭璧、符玺及宫中国籍、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物。

丁巳，命焦友直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

三月丁卯，伯颜入临安，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礼乐器、册宝暨郊天仪仗，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图书祭器、乐器等物。

冬十月丁亥，两浙宣抚使焦友直以临安经籍、图画、阴阳秘书来上。^②

宋朝的官藏图书可以说尽归于元都了。正如后来阿鲁图在《进宋史表》中所说：“太祖取金，世祖平宋，混一区宇，典章图籍皆归秘府。”^③元人十分清楚这些图籍的意义和用途。《元史·董文炳传》载：

伯颜命文炳入城，罢宋官府，散其诸军，封库藏，收礼乐器及诸图籍。……时翰林学士李盘奉诏招宋士至临安，文炳谓之曰：“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大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④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宋、辽、金“各朝本有各朝旧史”^⑤，《四

① 《元史》，卷九，《世祖本纪》，1976年。

② 《元史》，卷九，《世祖本纪》，1976年。

③ 《元史》，卷一三九，《阿鲁图传》，1976年。

④ 《元史》，卷一五六，1976年。

⑤ 《廿二史札记》，卷二三，“宋辽金三史”条，1984年。

库全书提要》亦说，元修《宋史》“盖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①，即是指不仅使用了这批图籍，而且修史时主要参考了宋朝的旧国史。不用说，这批图籍即是后来元朝修史的基础。元朝在得到宋代的图籍后，即已经在考虑《宋史》的修撰了，实际上《宋史》的修撰早在世祖时即已开始。阿鲁图《进宋史表》云元初世祖皇帝：

及夫收图书于胜国，辑辅弼于神京，拔宋臣而列政涂，载宋史而归秘府。然后告成郊庙，锡庆臣民，推大赉以惟均，示一统之无外。枢廷偃武，既编戡定之勋；翰林摘文，寻奉纂修之旨。

贝琼《清江贝先生集》亦云：

自我世祖皇帝立国史院，尝命承旨百一王公修辽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词臣通修三史矣。^②

赵翼亦认为：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王鹗请修《辽》、《金》二史，诏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寻又诏史天泽亦监修。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此元世祖时纂修三史之本也。可见元世祖时，三史俱已修订^③。

世祖之后，又数次诏修《宋史》。成宗大德（1297—1307）初，馆臣袁桷云，曾“伏睹先朝圣训屡命史臣纂修辽、金、宋三史，因循未就”^④。为此，他奏“请购求辽、金、宋三史遗书”^⑤，以备修史所用。此后，“延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正史类二，1965年。

② 贝琼：《清江贝先生集》，卷二，“铁崖先生传”条；又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正统辩”条，1922年。

③ 见《廿二史札记》，卷二三，“宋辽金三史”条，1984年。

④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一，《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条》，1936年。《新元史》，卷一八九，《袁桷传》云：“大德初，阎复、程钜夫、王构俱荐之擢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成宗初，建南郊，桷进《郊祀十议》。”1935年。

⑤ 《元史》，卷一七二，《袁桷传》，1976年。

祐（1314—1320）、天历（1328—1330）之间，屡勤诏旨”，但皆因“三史正统之议未决”，而“卒无成书”^①。至治（1321—1323）年间时，英宗尝命虞集“修辽、金、宋三史”^②，但终未见成绩。尽管这几次修撰终无结果，但它说明了元统治者对修撰前朝史的重视，而且毫无疑问为后来至正年间的纂修奠定了基础。

脱脱主持修纂的《宋史》，卷帙浩繁，凡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其中《乐志》十七卷。

二、《宋史》的版本

《宋史》至正五年撰成后，翌岁，即雕版付梓。莫友芝《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云：“宋史以至正五年十月进表，即于六月咨浙江行省差史官翰林应奉张翥驰驿赍净稿前去，选匠依式镂版。”该版即是《宋史》最早的版本。《宋史》的版本，主要有11种，它们是：

1. 至正本：元至正六年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刻本。
2. 成化本：明成化七年至十六年朱英刊本。
3. 南监本：明成化七年至十六年朱英刻嘉靖南京国子监重修本。
4. 北监本：明万历二十三年至三十四年北京国子监刻本。
5. 汲古阁本：汲古阁刊印本。
6. 殿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
7. 道光本：清道光十六年重刊殿本。
8. 光绪本：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刻本。
9. 石印本：清光绪二十八年，史学会社石印本。
10. 百衲本：1930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11. 中华书局本：1977年北京中华书局。

监本中有不少是递修、修补、配补和抄补本。

至正本，即初刊祖本。莫友芝云：“其本每页二十行，二十二字，中行

① 贝琼：《清江贝先生集》，卷二，“铁崖先生传”条，1922年。

② 《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1976年。

上右旁书通卷，中截大书纪、表、志、传等分卷。”^① 傅增湘云：“元至正六年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刊本，十行二十二字，细黑口，四周双栏，北京图书馆藏，为内阁大库旧贮。”^② 又云：“友人叶君曾校过，极称其佳绝。”^③

成化本，明两广巡抚朱英成化中刊于广州。傅增湘云：“明成化七年朱英刊本，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阑，刊工粗率，与至正本大不同。”^④

南监本，傅增湘云：“成化中两广巡抚朱英刊于广州，后取其板置监。”^⑤ 顾炎武亦云：“嘉靖初，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请校刻史书……仍取广东《宋史》板付监。”^⑥ 邵懿辰又云：“南监板二十一史，无修补者佳。梅伯言，路小洲家，俱有初印本，修板存南京，嘉庆间毁于火。”^⑦

北监本，顾炎武云：“至万历中，北监又刻《十三经》、《二十一史》，其板视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粲然于人间矣。然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⑧ 傅增湘亦云：“明万历二十七年北京国子监刊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阑。”^⑨ 邵懿辰又云：“北监板系从南监本翻刻，虽行款较为整齐，不如南监较古，且少讹字。”^⑩

汲古阁本，莫友芝云：“汲古阁有刊本，行印绝少。”^⑪ 邵章《续录》又云：“汲古阁十七史外，尚刊有《宋史》与十七史同式。”^⑫

① 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嘉年整理：《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1993年。

② 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嘉年整理：《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1993年。

③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史部，中华书局，1983年。

④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史部，中华书局，1983年。

⑤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史部，中华书局，1983年。

⑥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八，“监本二十一史”条，岳麓书社，1994年。

⑦ 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五，史部一（原中华上编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⑧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八，“监本二十一史”条，岳麓书社，1994年。

⑨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八，“监本二十一史”条，岳麓书社，1994年。

⑩ 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五，史部一（原中华上编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⑪ 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嘉年整理：《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1993年。

⑫ 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五，史部一（原中华上编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殿本，作托克托撰。邵懿辰云：“殿本行款仿北监板，诸史校对俱精。”“道光四年新修殿板，亦加校对，然多浅学误改，人不甚重，仍以乾隆四年本为佳。”^①

百衲本，傅增湘云：至正本“已印人百衲本二十四史，缺卷以明成化朱英刊本配补”^②。

由于《宋史》的正史性质，其版本以官刻为主。尽管各本间仍有质量高下之分，但总的情况是，版刻、校对都比较细致，讹误的情况比较少。总起来说，从元至清《宋史》版本比较单纯，版本间的承递线索也比较清楚，基本上成一个系统：元至正六年本为原版初印，明成化本翻刻元本^③，南监本版出成化本^④，北监本翻刻南监本^⑤，殿本重校刻北监本^⑥，

① 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五，史部一（原中华上编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② 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1993年。

③ 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卷四，史学第五云：“《宋史》四百六十九卷，明成庚子翻刻元本。前有至正五年中书右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前右丞相脱脱等《进宋史表》，目录后有校勘臣彭衡暨、丁士恒十人姓名，黑口，补板白口，有年号，有成化十六年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御史桂阳朱英序。后有跋，阙末叶，不知何人。然瞿陆书目均收此书，不言后跋，想均失去。”张元济《元至正刻宋史跋》：“桂阳朱英总督两广军务时，得漳浦陈布政家抄本，复于浙中得善本，以补其缺，成化十六年刊成。”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元槧本跋云：“盖成化本即以元刻翻雕，进表咨文、总裁官、修史官、提调官、行省提调、校勘衔名皆全。”瞿塘编撰，瞿果行标点，瞿凤起覆校《铁琴铜剑藏书库目录》卷第八则云：“明成化间广督桂阳朱英得钞本于漳浦陈布政，为序而刊之。经始于成化辛卯十月，刻成于庚子四月。”

④ 见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五，史部一，中华书局，1959年。《续录》：“成化十四年两广巡抚朱英刻于广州，后取其版入南监。”另，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史部：“成化中两广巡抚朱英刊于广州，后取其板置监。”1983年。

⑤ 见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五，史部一，中华书局，1959年。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元槧本跋云：“南、北监本即据成化本付梓。”1892年。

⑥ 见《清代殿板书目》，乾隆朝：“右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重校刻明北监本。”又，《故宫所藏殿本书目》（1933年），卷二：“右钦定二十四史，清乾隆四年重刊明万历北监本。”均见陶湘编，窦水勇校点：《书目丛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1、381页。

百衲本用至正本配补成化本而成^①，而中华书局本则以百衲本为其底本。

《宋史》（包括其中《乐志》）刊印成书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了。从版本角度来看，《宋史》主要以官刻版本传承，版本系统单一。这种情况表明，该书基本保存了编纂之初的状况，在传播环节上资料信息的损失比较小。该书不仅提供了一个比较真实的展示宋代历史状况的文本，而且提供了展示宋代宫廷音乐基本状况的文本。我们据此认为，《宋史》中的《乐志》，可以是我们今天了解和认识宋代宫廷音乐文化状况的一个值得信赖的文本。

（本文原载《音乐艺术》2004年第2期）

① 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补云：至正本“已印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缺卷以明成化朱英本配补”，中华书局，1993年。

隋前五部正史乐志及其文本传统

李方元

中国是音乐传统悠久的国家，也是史学传统悠久的国家，以文本专门记载音乐，自西汉的正史《乐书》问世以来，已形成了一个传统。传统是一条河，这个传统一直持续至清代。

正史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载述一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大典。以纪传体为其体裁特征，始自汉代的《史记》。正史之名创自阮孝绪《正史削繁》，《隋书·经籍志》已在目录中单列一门，归《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于正史门下。至宋代，定著正史为十七种，后世又有增列，至清代定为二十四种。正史多官方修撰，或最终须经朝廷认可，其主要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统治的经验和理论，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并发挥着特殊的社会作用。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五《正史类叙》所说：“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永榕等 1965：397）尽管这类历史著述受到社会主流意识的影响，受正统思想和立场的支配，但仍然是一朝国史的历史记录。这种记录本身也是历史，是历史的一种独特的反映。正史《乐志》的背景亦然：记述以宫廷为主要对象的音乐活动及其典章制度，代表官方的音乐态度和立场，同时也是官方视野下一个时代的音乐文化的反映。

今天的“二十四史”，宋代以前有十九种，其中十种有《乐志》，它们是《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宋书·音乐志》、《南齐书·乐志》、《魏书·乐志》、《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旧五代史·乐志》。《乐志》的修撰，自身形成了一个传统，各部《乐志》既体现这个传统，又创造发展着这个传统。了解各部乐志的历史面貌，既可了解乐志修纂这个传统，也可了解我国乐志的修纂及其文本的基本状况，从而加深对历史上这类资料的特点与性质的理解。本文研究的是隋前编撰的前五部乐志的纂写及其文本状况。

009

隋前五部正史乐志及其文本传统 |